

中国现代哲学史

资料汇编续集

辽宁大学哲学系

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编

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第十六册）

抗日战争时期的哲学论战

（下）

主编 钟离蒙 杨凤麟

一九八六年四月 沈阳

目 录

一年来之哲学界·····	张东荪 (1)
中国思想发展之回顾及其前途·····	林一新 (5)
现阶段中国哲学界的派别·····	张非飞 (14)
什么是新启蒙运动·····	张申府 (18)
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学术蠡测·····	甘贄仙 (19)
中国近二十年之社会改造思想·····	杨 铨 (33)
思想界之方向转变·····	杨东莼 (36)
中国现代思潮之原流及性质·····	鲁 夫 (39)
我们需要什么教育哲学·····	卢心远 (47)
世界两大思潮之演变·····	罗承烈 (51)
科学与人生观——近几年来中国思想界底总结算·····	彭 康 (55)
现阶段的中国思想问题·····	沈于田 (68)
现代哲学的主潮——一九三六年哲学界的一个结算·····	张申府 (70)
马克思文艺论底断篇后记·····	瞿秋白 (76)
哲学与科学·····	张东荪 (80)
科学与真理·····	叶 青 (87)
科学与思想·····	叶 青 (105)
我们的目的与方法·····	叶 青 (125)
怎样研究理论·····	如 松 (128)
怎样研究哲学·····	叶 青 (134)
研究哲学的基本方法·····	叶 青 (136)
论哲学的消灭·····	叶 青 (139)
哲学之概观·····	如 松 (152)
哲学是什么? 有什么用处? ·····	杨伯恺 (159)
哲学究竟是什么? ·····	卢心远 (162)
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	张季同 (164)
研究哲学之重要·····	杨成柏 (168)
哲学不是空虚的·····	郑冰寒 (169)
中国哲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摘要·····	中国哲学会 (170)
中国哲学会第二届年会论文摘要·····	中国哲学会 (180)
胡适论·····	胡 绳 (192)
评胡适之的实验主义与改良主义·····	彭述之 (197)
知行, 行功不易·····	胡 适 (205)

十年来之哲学界

张东荪

一

哲学是自由思想的产物。苏格拉底为了哲学而被毒死。但他们却造成了希腊的哲学。布鲁诺（Bruno）为了哲学而受绞刑。但近世哲学却由他们而开始。所以哲学之花，必须由自由思想之空气方能培养。没有自由思想亦就没有哲学。

这十年来自由在世界上各处都受了打击。所以今天要我来讲十年来的哲学，我只能说哲学在这十年中并没有甚么进步。

不过虽没有大的进步，却亦未尝没有几本重要的书出版。现在我只好以书的出版为标准来谈一谈近十年来哲学界的情形。

现在先从英美说起，因为就哲学来讲，英美是一组，德国与法国又各是一组。而我个人对于大陆的哲学情形不甚知道，所以只好从略。况且德国在以前虽是哲学最盛的国家，现在却因为没有自由思想，这个哲学之花已在那里渐渐萎缩下去了。

因此我只能谈一谈英美。英国的大哲学家亚历桑逊（S. Alexander）告诉人说，英国的自由主义决不会倒，并且对于世界将为支持自由主义之唯一的台柱。我想英美在这十年中哲学尚能有进步，大约就是因为自由空气尚存留于英美。

二

即在英美虽亦没有新的哲学发生，然而却有许多的哲学家在这十年中将他们的最重要著述完成了，换言之，即他们的哲学系统是在这十年中完成的。例如美国的杜威（John Dewey），他现在虽退老了，然在这几年中却出了三部重大著述。第一是《经验与自然》（Experience and Nature）。这是他的一部顶重要的书。因为他以前一向的著述多偏于名学与知识论。似乎好像不愿意深入于形而上学的领域。而这本书却是他的关于涉及形而上学的问题的作品。第二是《确实之追求》（The Quest for Certainty）。这本书可谓是前书之补充。总之，有了这两本书，他的哲学系统可以说是完成了。他完成其哲学本店以后又向美学方面开一个分店。于是有最近出版的《艺术即经验》（Art as Experience）。我们可以说杜威哲学是近十年中完成的。

其次，我们又可以罗素（B. Russell）为例。他在中国所讲的《心之分析》不是他的重要著作。他的几个代表作品，却都在他回欧以后才出世。第一当推《物之分析》（The Analysis of Matter）。这本书虽不能算包括他的学说全部，然而却是他的著述中最精深，最根本的一部了。第二即是《哲学大纲》（Outlines of Philosophy）英国版则名曰（Philosophy）。此书把他的主张用很简洁的叙述，很明显的言语表现出来。读者看了以后，便可知他的思想亦是在离开中国了以后，而始达于圆满成熟的。

我所以先述这二个人，乃是因为他二人都到过中国。中国人亦习于知道他们。

三

这几年来，在英美第一个大哲学家当推怀特海（Whitehead）。他的大著作《自然与历程》（Nature and Process）是一九二九年出版的。虽则他的哲学在以前几本书中已具有了轮廓，然而在这本书中却有些新的意见加上去。至少关于“摄”（Prehension）一层是以前各书所没有的。他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是，“宇宙论之论文”（An Essay in Cosmology）似乎不甚有人注意。我则以为却很关重要。就是向来总把宇宙论作为本体论的。而现在哲学上的趋势却不然了。笛卡儿与斯披诺刹以本体论吸收宇宙论与认识论。洛克到康德是以认识论吸收本体论与宇宙论。到了黑格儿便拿宇宙论来吸收本体论与认识论。英国的新黑格儿派大将伯辣德来（Bradley）亦未尝不如此。怀特海虽不是唯心论者，却亦是走这一条路。他讲的‘摄’固是属于认识论的范围，然而他却是从宇宙论去解决这种问题。所以他自称他与康德在正相反的地位。就是因为康德以认识论为出发点，而他则以宇宙论为出发点。他的最近著作是《自然与生命》（Nature and Life）一个小册子。在这个小册子中却可窥见他的哲学的大概。他是根据新物理学把‘物块’（即一块一块的物质）与‘纯空’（即虚无一物的空间）这两个观念都打破了，以为只有波动而没有物质。这个世界直是一个‘波动’的总场。其实此说亦不仅是如此，凡受过最新科学洗礼的大概是如此主张。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起来丁顿（Eddington）了。他由科学而进入哲学虽不尽在于他的《物理世界之性质》（The Nature of Physical World）一书。然而这本书总算是他的最重要作品。他在以前的著作中虽把科学的宇宙观充分说明，然而以心为太素之说（Mind-stuff）却始自此书。我个人对于这个学说并不十分感兴趣，而只是对于他和其他科学家把物理与认识视作不可分开的一点，则认为可算千古不刊之论。其实这乃是现代科学家所共认的，而非哀丁顿一人之言耳。如靳思（Jeans著有The New Background of Science）林忍（Lenzen 著有 Physical Theory）怀尔（Weyl 著有 Mind and Nature）大概都是同一主张。可见唯物论的塌台不由于哲学本身，乃是由于科学。换言之，即科学愈进步，虽不是愈近于唯心论，却确是愈远于唯物论。

四

我个人在现代哲学家中比较上最佩服的是美国的路维士（C.J. Lewis）。我佩服他的地方不在于他的符号逻辑，虽则他与朗甫德合著的一本《符号逻辑》可算是此中的一个经典。我所引为可大注意的乃是他的《心与世界条理》（Mind and World—Order）。这本书的出世可以说在认识论上至少扫除了许多的误解。所以不仅我个人有所感服，即在英美亦是引起了很大的注意。他的功劳在于把以前许多没有弄清楚的问题都弄清楚了。须知哲学家对于人类的贡献往往不在他的答案而在于他能提出新的问题。倘不是提出新问题，亦必须把旧问题中含糊不清的地方弄得清楚。路维士虽不是像康德那样的第一流大哲学家，能提出新的问题。然而他却能把旧来认识论上的问题加以分别安排：使先验论与经验论以及唯物论各得其所。同时他却不是一个折衷论，而又有其独到的见解。所以这本书，亦可以说路维士这个主张，乃是近来认识论的一个杰作。（但我亦不是完全赞成他的主张，我有好些地方不表同意，

详见拙作《认识论》。他的来源是杜威一流的唯用论，同时又是晚近才发达的新逻辑（即符号逻辑）。并且亦还受了些新物理学的影响。其实他的主张亦很平易。惟其平易，所以才不失为真理。

详述其内容非本篇的目的，不过我敢十二分诚恳地推荐于国人之前：要知近代认识论是甚么，非读此书不可。并且必须知道离了认识论不能讲哲学。现在有一班‘伪哲学’（Pseudo—Philosophies）出现，其故，就是未经过认识论的训练。

五

因认识论，便使我想到心理学方面。现在有三本书大可注意。第一是斯道特（G.F. Stout）的《心与物》（Mind and Matter）。其内容虽是一九一九年至二一年的演讲，然却是在一九三一年出版的。书中大体讨论心身相关问题。而对于主张心是由物而出的所谓唯物论则从各方面为之攻击。他以为心之起源不能求之于物。这虽是一个消极的主张，然其出理却强于任何积极主张。第二是福克私（C. Fox）的《心与其身》（The Mind and its Body）。这本书的长处是能充分引用近来心理学的成绩。就中尤得力于安德林（E.D. Adrian）的《感觉之基础》（The Basis of Sensation）一书。他的结论亦和斯道特一样，以为心之起源仍必为心，而决不会是物。凡以为心由物而出，在科学上皆得不着证明。可见不仅新的物理学离开唯物论愈远了；并且即新的心理学亦是离开唯物论渐远。现在最奇怪的是：在哲学上反有些人高唱唯物；而在科学上则大部分都承认唯物论是过去的东西了。第三是哈松（C. Hartshorne）的《感觉之心理与哲学》（The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of Sensation）。此书比福克私的书又进一步了；他充分引用实验的成绩。可以说是对于实验的一个解释。他的最后结论是把感觉归并于‘感情’（feeling）。而以为每一个细胞都有感情。他自称其说为泛心论（Panpsychism）之一种。

总之，这三部书各有其来源，而结论却不期然而然走一条路线上去。这未尝不可说是这十年来思想界上的一个特徵了。

六

以上所说自是太偏于英美一方面。在英美以外，未尝没有可述的。第一可算异军突起的是所谓奥国维因那派。此派的领袖是卡拿帕（R. Carnap）与须立克（M. Schlick）。而柏林大学的来兴拔哈（H. Reichienbach）亦是属于这一派。在英美则称此派为逻辑的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卡拿帕的论文很多，就中英译的有一本小书是《科学之统一》（The Unity of Science）。虽只有一百页，然而却很足以看见他们的趋势。他们只知道逻辑的分析。对于一切传统的哲学问题，以逻辑分析为‘剃刀’，倘使分析而无意义，则这个问题即不能成立。他们这样一办，哲学问题中不能成立的可就不在少数。例如唯心与唯物之争。亦就是不能成立的问题之一。唯用论以效用为准标，把哲学问题删汰了一番。现在这个逻辑的实证论却用逻辑的意义为标准另行删汰。所可惜的只是这一派迄今尚未有大部的系统著作出现。至于来兴拔哈，其演讲《原子与宇宙》却有英译本。这部书虽讲最新物理的概念，然而对于哲学的态度亦可以窥见一斑。不失为一个必读之书。他们有一个杂志，曰《认识》（Erkenntnis）；美国近来亦有一个《科学之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杂志为之

响应，可惜不甚好。

七

凡此所述都是外国哲学界的情形。现在似乎亦得说一说中国的哲学界。去年大夏大学作十周年纪念，要我作一篇‘十年来之中国思想界’，我踌躇好久，没有敢应允。须知既谓中国思想，必须是中国自己的思想。我们试看国内究竟有多少自主的思想！虽然刊物如牛毛，论文可充栋，然而很少是自抒所见的。差不多总是抱着外国的某某一派，来替他摇旗呐喊。其结果只把中国当作了外国学说的战场；而始终不见有中国自己的学说与思想。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题目很难下笔。

但现在我既述了各国的哲学界，则对于中国亦不可完全付之缺如。在不得已之中，亦可寻出几点来说一说。第一是对于西方哲学的介绍，在近几年确比以前不同了。不复是‘报告’（information）性质，乃兼有‘研究’性质了。其书名恕不列举。就中符号逻辑的输入中国亦是可纪念的一件事。（如沈有乾的《现代逻辑》与吴士栋的《论理学》）。第二，可以说是具有独立研究的趋势，这一点在北平发刊的《哲学评论》杂志上可以看得出。撰稿人中有金岳霖，黄子通，瞿世英等。他们好象有一个共同点，即是只知研究而不知派别。

此外亦还有可述的：以我所见，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不失为近年来的一部奇书。书内所主张亦许为我们所不赞同，然而其为好学深思的结果，则不容否认。

我个人亦曾提出一种认识论上的意见——就是认识的多元论。我不敢说有何创见，然而却亦由多年思考而得。或许我此说未必能成立，然而把多元的解释用于认识作用上，这一层我愿意列为问题，请大家来讨论。现在我提到自己，亦只是为此而已。

八

说到这里一定有人问我：你为甚么对于现在大吹大擂的辩证法唯物论一字不提呢？我的答案很简单，就是：如果哲学一辞是取广义的，把历史理论与社会理论包括在内，则这种学说当然亦是哲学之一种，倘使以为除了历史理论与社会理论便没有哲学，则事实确实显示：哲学于历史理论与社会理论以外有其独具的问题。这些问题乃是哲学之本有的范围。所以辩证法唯物论只是历史理论与社会理论，而不是哲学；换言之，即决不能取哲学而代之。一切无聊的争论都由于不明这个分别而起。一班辩证法唯物论的信徒总想打倒正式的哲学，其实只是纠缠不清罢了。他们始终不明白马克思主义上所讲的问题与哲学上所讲的问题完全是不同的。可怜亦复可笑。

说到可怜，我们中国人今天真是可怜！在思想上差不多一点儿自主性都没有了。只知模仿。恰如鹦鹉学舌，猴猕弄棍。哲学本来是冷门。而在中国居然热闹了。其所以然不在于国人自动地喜欢哲学，乃在于有见于俄意的情形。俄国的共产党有他的‘钦定哲学’；意大利的推喝团亦有他的‘御用哲学’。于是善于模仿的中国人便把哲学亦当作时髦东西了。但是据我看来，哲学与自由思想是分不开的。哲学而变为钦定的与御用的，这便是装甲的哲学。哲学而变为武装的，则必定不是哲学。这乃是哲学其名，而宗教其实。所以我在本篇中不愿意提起俄罗斯与意大利的哲学。（德国国社党亦有他的哲学，真是哲学哲学天下多少罪恶借汝之名以行）。

九

最后似乎应得提到对于未来的展望。金增广先生以为今后中国需要一个有机的哲学。有机的哲学一辞倘若是作类乎怀特海哲学那样的解释，我亦未尝不可同意。不过我以为今天中国所需要的不是那一种哲学。而只是可以使哲学滋长与发展的空气。用一个比喻来换言之，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不是树上结的果子，乃只是一个很好的田地，可以容我们去努力耕种。倘使我们能努力，不愁没有果子收获。否则生在石田里而希望果子，必不会成功。因此我以为中国研究哲学的人们不可仅急急于创造哲学系统，而同时亦应得注意于哲学空气的造成。须知哲学只有在哲学的空气中可以滋长，若在武装中则决不能生存。英国的哲学家乔德（C. E. Moad）似乎亦看到这一点；他约了一班学者作了一个《宣言》，主张全世界上爱自由的人们联合起来，以抗现在各处的这个，反自由主义’狂澜。我认他不为无见。总之，中国今天的情形亦正和世界一样。所以我说不需要某种哲学，而只需要可以使哲学发展的‘思想自由’。

本篇虽为光华大学纪念而作，但文责却是自负，特此声明。

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写。

（原载《光华大学》半月刊第三卷第九、十期，一九三五年出版）

中国思想发展之回顾及其前途

林一新

引言

中国思想界目下的混沌贫弱和枯竭，已成了一种显著的现象。人们头脑的麻木，正和中国今日经济之不断糜烂，和民族颓丧同其程度。现在甚至有一部分人，藉口中国之特殊性，而竟欲恢复中国数千年来之木乃伊，显然地或隐然地企求拍出旧的固有传统思想。思想界亦是和一切事物现象的规律相类，如果不求进步，便是退步，至少将处于一个停顿时代。

从抽象上说，一般思想的发展，我们是应该注意各种特殊性和时代性，而且应当符合于我们民族的独立发展，那是毫无疑义的；然而所谓特殊性和时代性在现在到底是什么？怎样的一种文化思想，始能激发我们民族的强烈精神？我们应当沿着什么道路前进？——这是我们不能不考虑的问题。无论如何，文化思想是历史发展的特定产物，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便是一种历史自觉，能细心地观察昨日，如是我们才能前进。今特为此文，和一般进步而有志于思想运动的人们共同讨论。

我觉得中国全部社会思想的发展，是具有它显著的，特殊的历史逻辑。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历史，我们不能在此详论，但我们可以概括地说，中国过去的思想进步，除了二千多年

前，曾一放自由精神和古代唯物论的光辉之外，直到清季，都是笼罩在一个麻木不仁的儒教之下，中国古代思想发展虽经种种形式上的变化，但在精神上终没有根本的改变，梁启超说得对：

“我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书，而思想一窒，（这有讨论之点，今不具论——本文作者。）汉武帝表章文艺罢黜百家，而思想又一空。自汉以后，号称行孔教二千多年矣。而皆持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为一贯之精神。故正学异端有争，今学古学有争，言考据则争师法，言性理则争道统，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为非孔教……浸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马季良，郑康成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韩退之、欧阳永叔矣，浸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庵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顾亭林、戴东原矣，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如群狼得一果，跳掷以相攫，如群姬得一钱，诟詈以相夺，情形抑何可怜……此二千年来保教所生之结果也。……”（见壬寅年《新民丛报》）。

梁氏这些话，确将中国全部思想发展的一贯精神完全表现了出来。中国此种传统思想，不但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上，占取数千年来之统治地位，而且此种迷漫大空的毒气，竟是无孔不入，甚至影响中国全部之史的发展，模糊和窒息任何一种新进的动机。上层文化的建筑物对于社会发展之重大反影响，像中国这样，在世界上任何一地，都不曾经见。中国封建社会内代表新兴力量而与历史传统不同之精神文化，虽有萌芽，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新的“思想”“体系”，能与旧传统相对立。此种代表另一种的不同精神文化的萌芽，在数量上以极微弱和不自觉的形式，极缓慢的速度，徐徐增长，有时且停止不前，而终不能有质量上之转变。即不能独立成一新的思想。这种萌芽，在巨大机构压榨之下，只能在许多“白话小说”中得到它较大的表现。在这个小说中，常表现商业发展后，人们对于封建制度的种种不满，比较不受礼教束缚之新情绪，和一种较广大的世界观念等等。它常表现企求解放的感觉。换言之，这只是一新的“社会心理”的表现而已。社会心理是一种新的社会思想形成之前提；但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想不同处，便是社会心理是散漫的，自发的，而社会思想则是“体系的”，“自觉的”。在中国旧的思想传统支配之下，只能有新的社会心理，能得到若干之表现，而不能成熟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想体系。

中国过去全部社会思想的发展所以陷入如此的状态之中实因中国过去一切发展都太被拉长所致。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历史道路和它的特质，是从中国一般历史发展的特质中来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中国本身具有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使生产力的发展，遇了许多的障害，不能不采取缓慢发展的形式。中国的典型封建社会自从周末破坏以后，在战国时代，形成了新旧势力斗争的大变动的年代；秦汉统一国家之建立，和当时商业之巨大发达等情形，原都是照着一般历史的形式前进。使秦汉以后，中国环境，外无四围游牧民族之包围，内无高山大岭之阻隔，则东南西北，无有不达，又何至走此不顺利的道路？不幸特殊条件限了中国，使其不能急速引起社会变革，而辗转拖延了数千年！因此，在西欧的发展，例如城市，只要二三世纪的时间，可以从中世纪末及十多万的城市，一跃而为伦敦、巴黎数百万的大都市，而在中国，城市虽发达甚早，而且规模亦大（中国数十万的人口城市，早就普遍，中世纪时比欧洲当时，都大过几倍，）然而历数千年之发展，却前后所差无几，而不能突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之上。人家是在短时间内以巨大的步骤，突跃地向前进，而我们则是在长时间的过程中，踏着“官步”一步一步地摇摆前去。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与众不同的特殊点：它不得不忍耐许久的痛苦，打许多曲折和循环的圈子。这即所谓长期停滞

的道路。但中国思想的发展，虽然是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发展的特性中产生出来，但当传统思想一经发生在这个停滞社会基础之上以后，它便更要发挥它的极巨大的作用，思想的液汁是在这个物体转动过程中榨取出来，但此液汁既经流出之后，便要再流遍全物体，而更阻止它的向前转动。它又像一种气体，发出之后便要窒息全部的活动组织。这就是中国儒教的传统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独特的作用，实不仅在思想的领域内排挤了其他的新思想，而且麻木了思想发展的车轮。

中国数千年的古代文化史或思想史，尚待杰出的创作，但我们以上所述，已补中国全部古代文化思想的发展，画了一个大概的轨迹。中国数千年的古代文化史，是需要重新批判的，但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中心轨迹，始能了解贯通全部数千年文化史血脉流通中之主要特性。

二

然而，中国历史的发展，在明清以后，那时中国生产力发展，经数千年之挣扎，已有相当排除历史种种条件限制之可能，国内民族市场已有成立之象，海外交通和殖民地的攫取，亦在展开之中，如果能循此前去，则中国亦可自动走到资本主义经济。而在此种情形之下，中国的儒教思想，自能受一打击，许多萌芽的新思想，可以迅速成长，如是数千年来之一统和沉死局面，亦可打破，同时，在中国新思想的发展上，事前亦可以替它扫除道路，并准备下坚固的根基。

不幸中国过去历史太慢了，就似一个人太懒惰一样，现在受到了报应，在国际上人家已先于我们而发达，现在赶在我们前面，作为我们有力的竞争者和压迫者了。中国历史发展又受此新的限制，只得仍旧再停留在原来的状态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之发展，并非依于内部自然生长之结果，它是在后来外部逼迫之下在短时间内完成急亟的转变的。

自鸦片战争直到中日战争以前这一时期不用说了。这一时期只有李鸿章的练兵强国的洋务，郭嵩焘、张之洞等的所谓实学，实际上在此数十年内，思想上是无丝毫变动的。这种原因是很显然的，就是因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动，既是完全出于外力，事变之来是非常之快和猛烈，所以触力接最强的地方，便先行开始变化。“老大帝国”和帝国主义相遇之后，最先感觉到的便是外国的船坚炮利的可怕。所以只从技术实用上力求进步，而思想上的发展，在中国人素来既未经过何种变动，即不能在一时间赶上外表事物变化之神速。然即就中日战争后的时期而言，那时中国社会的各种力量，在一个新的打击之下，真起了一个大的动荡，然而时亦仅酝酿后来政治之大波澜。立宪派和革命派之斗争，只是基于当时中国经济中官僚资本和华侨资本之两种成分而生之两种政治倾向；前者与旧的封建关系较深，只能形成清廷之一种反对党，后者较多带一些自由主义的色彩，但主要问题只是集中于政治制度问题之论战。当时确实发生了一种进步的政治纲领和主张，革命派曾提出彻底的民主政制，甚至彻底的土地德谟克拉西（就一般历史发展而言，）但不能产生一整个的新的文化思想运动，而只不过有一二微弱的变动。思想发展终远落于技术实用和政治之后，实由于中国历史发展条件及其所发生的必有的不平衡规律所支配。

我们再来观察当时所谓思想上微弱之变动，尤可发现中国思想发展中之重要现象。

首先有康有为、梁启超的今文学运动。康梁一派，虽然在政治上落后，而在思想上却做了破坏工作。这是因为康梁一派受有过去教育，知道思想上作用之重要。在政治上欲求进一

此之改革，则不能不求思想上之根据。梁启超祖述康氏之意说：

“…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改制之言立，则以为《春秋》者黜君威，而伸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去内竞而归统一，革习惯而遵法治，…

“三世之义立，则以进化之理，释经世之志，遍阅群书而无所关，而导人以后来之希望，现在之义务，…南海以其所怀抱，思以易天下，而知国人之思想，束缚既久，不可以猝易，俾以所导引之人为鹄，就其所能理解者而导之，因此而引入政治，美孟而剔荀，发明当由专制进为立宪，共和之理。…”

康有为在《伪经考》和《改制考》中欲藉否认古文而在思想上别开生面，此在当时实曾震惊了传统思想，叶德辉责其“其貌则孔，其心则夷，”翁同龢称之为“说经之野狐禅”，而朱一新之言，尤表示当时卫道者之一种心理；他说：

“自伪古文之说行，其毒中于人心，人心中有六经不可尽信之意，好奇而寡识者遂欲黜孔学而立今文，夫人心何厌之有？六经更二千年，忽以古文为不足信，更历千百年，人能必以今文之可信耶？……窃恐□古人不已，进而疑经，疑经不已，进而疑圣，至于疑圣，则其效可觀矣……”。

我现在暂不把康有为在他的著作中，特别是在他的《大同书》中所表现之思想，加以何种分析，他的思想只是欲求变动，而不敢变动，且亦不能有何大变动，对于我们考察思想发展或变动过程上说，最重要的，便是康有为的今文学运动，表现了思想变动中旧传统对于真理之排除，旧的思想毒计之窒息作用之真相是如何。康有为等欲提出一些进化变动之见解，终不愿独自主张，而必须“托友”，这不仅仅是因为当时在客观上旧的思想潮流，尚在淹覆了一切，使其不敢有所独创，而且因为他自己在主观上仍旧是以儒教孔子为最高和唯一的范围。

“后来的”梁启超以下的话，是足表示当时的一般情形和康梁的“思想运动”之一种本性。他说：

“今之言保教者、取近世新学理而缘附之，曰：某某孔子所已知也，某某孔子所言也，……然则非以此新学新理厚然有当于吾心而后之也，不过以其暗合于我孔子而从之耳。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万一遍索《四书六经》而终无可比附者，则将明知其为真理而亦不敢从矣。万一吾所比附者，有人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弃之矣。若是乎真理终不能饬遗我国民也……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益滋之也”。

我们在中国思想变动过程中，其先看见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标语，其后又是“以西学缘附中学”。此等情形，在今日犹且存在，何况当时？

在这个时期中，尚有严复和李煜瀛等的思想介绍工作。严复曾努力介绍了欧洲十九世纪的主要思潮，输入了英法的哲学思想，英吉利的经济学说；李煜瀛亦介绍卢骚甚至于克鲁泡特金。这些都是进步的学说，然而在当时影响极微，虽然使中国人也略知道了除了自己之外，别人亦有“极高之思想”，而物竞天择，天演公理等亦若干流传于人口，但在全部情形而论，终因排拒力过大而无何种重大作用而至于中绝。

中国传统思想之阻碍新思想的发展，实已成为思想发展之一倾向，这是我们应当认识的。然而中国旧思想之所以能继续发挥他历来之作用，不但因为过去长期历史已养成它最保守排他之性质，而且近代历史之过于急速变动，实有以促成之。中国思想和欧洲各国思想发展最不同之一点，便是因为欧洲代表新兴力量的思想，对于封建社会内之旧传统思想，在很早以前就经过了长期的斗争。例如英国在十四世纪时即已发生唯名论和实在论之论争，已开

始注意客观法则等等，对于中世纪僧侣所支配之合理主义的烦琐哲学，已就开始分裂了。又如十六世纪以后南欧所发生之“文艺复兴”运动等等，实际上已是代表第三阶级之独立前驱，对于旧思想已下痛击了，他如笛卡尔，斯宾诺查之出现，都表现他们在事前经过了无数之澄清过程。这自然是欧洲一般的历史变动和中国不同所致；在他们，新社会的一切条件，在封建社会中就已成熟了基本模形，十七八世纪以后之变革，不过是只须把封建的外壳打破就够了，在外壳未打破以前，胎儿实已成了一个“人的”样子了。而中国近代社会史，则是如一个未足月的小产，它为了外来强制力的打击，才不得不出来和世界见面，安得不是带着满身胎毒，而胎患至于无穷呢？

三

另一方面，此种情形，对于新思想之发展，又产生了一个重大的结果，便是新思想发展，不但受了旧的遗毒之影响，而且没有新的传统。中国思想发展由同一根源而发生和欧洲不同之又一点，便是它不是由过去思想发达的逻辑结果。在欧洲各国不但有以上所略列举的那种思想运动之先驱已存在于新思想集成以前，而且还有“现成的”古代希腊、罗马的进步思想，如德谟克里德，热诺，伊壁鸠鲁，西塞罗……等人之一千多年前的宝藏，一动手便可开发。他们是有重重的遗产可以承继；而中国受了过去历史之束缚，则是“空空如也”，除了二千多年前的诸子哲学可以称述外，实在什么东西都没有。即有之，亦不过我们前述所谓萌芽思想，此种萌芽思想，不但不能对于新思想，起何种推动助长之作用，反而必须新思想已有更高之成就后，始能揭发其进步性。有人如谓中国前期亦有足以代表“中产阶级”之前驱思想，则我们固未尝抹杀，同时我还以为我们对于此等处于萌芽状态之有进步性的思想，应当加以系统之发扬，以便证明即在旧传统中，仍有进步思想之一脉相传，藉使其对于今日思想界之进步，作一种助力作用。我们诚然需要这样一部自觉的历史，用社会斗争发展的观点，来阐明若干有进步性思想在我国历史之自我途路上所表现之前仆后继的痕迹。但另一方面，一部好的中国文化思想史，是要指出此种萌芽思想之应有的历史地位，俾能了解中国社会思想之本质及其特殊发展形势，而跳出一向“自我夸大”的圈套。假使欧洲古代文化史或思想史的任务，是在说明新思想是如何地继往开来，那末我们便是要说明我们是如何地“无往可继”；假使它的任务是在说明文化思想发展之一般的历史规律性，那末我们便要指出思想发展之特殊性、畸形性；假使它的任务，是在说明过去财产之难厚，应考虑如何加以消化和改造，那末，我们的结论，便是要指出我们新思想的发展中，是何等的空虚和枯竭。

自“戊戌变法”时期到民国五六年即五四运动中间，思想上在二十余年中，又中断发展。五四运动是中国第一次大的新思想运动。然而五四运动一样是缺乏新的传统，五四除提了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外，对于人生哲学和宇宙观方面，都无独特的表现。“五四运动”虽是当日民族觉醒和广大群众运动的动力之一，但并不十分光明。

五四运动之未能十分伟大，不仅是因为没有历史传统，而且是因为接受外来先进思想之缺乏。

关于吸收先进思想对于一国思想发展之重大作用，我们可以引俄罗斯作为一个例子。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也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但他们在思想发展上最大的一个特点，便是他们能够从西欧大胆地搬运必要的先进文化，来补充自己遗产的空虚，俄罗斯的著作界在十九世纪以后，能够赶上西欧，产生了无数的思想家，而成为二十世纪思想上的一个先进国，这是重

其原因之一。各国思想发展之不平衡，自然是受制于一般历史发展的内在原因，但思想的作用，却在一定历史条件之下可以改变他的行程，俄罗斯的落后，假使没有黑尔青，曲尔涅色夫斯基，布列哈诺夫，乌里亚诺夫等人，自觉的突起，自觉地运入先进国的文化，那是不能自以后的大收获，这是很明显的。

中国在这一点上，首先是受了客观的限制，也许这是可以计算入我们历史发展必然性之一部分吧，中国在历史上四围根本都是落后的民族，中国人只看见自己的“伟大”，（这种不自量的夸大遗传性，今日仍甚浓厚呢！）别无任何先进的民族文化思想，给与我们以任何的影响。在历史上唯一输入我国的，是东晋以后的佛教（那时有智顗，玄奘，宗密，窥基等人之昌理。）佛教在不长进的印度中发生起来，具一种悲观厌世的精神，到了中国，最易和腐化的儒教传统结合，它不但不能予以良好的影响，而且给予我们以恶影响。固然，佛教中确包含有一些进步的成分，如平等、变动的观念，但它在总的精神之下，流入中国之后，只能不发生作用。唐以后，儒佛合流，佛更变质，只有益增麻木了。晚清以后，仍是一种思想上的伏流，而且隐然流毒及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除了孔教以外，最能为人侈言者，便是佛教。不论在梁启超，章炳麟，以及后来之梁漱溟等等，佛教不都是构成他们著作或头脑之一部分或甚至重要之一部份吗？即使说到外来对我们有什么较好影响，也只有在佛教中作可怜的发挥，然此实为不易，唯有谭嗣同在那里取出其若干进步成分。佛教就是唯一的外来思想上之影响了，然而佛教在世界文化思想史上，能称之为先进的思想吗？

五四运动而后，那时东西的交通已甚密切，当时我们之留学西洋而回国的，为数亦不算不多了，宜其能够乘机摘取和介绍，亡羊补牢，事犹可及，然而那时欧洲前一阶段的进步思想的发展，不但早告终止，而且紧接而生的后一阶段的新进思想，也被淹没下去了。那时欧洲思想是趋向于反动和复古的年代，资本主义适在战后已走上没落的道路，所以有神秘复古的柏格森，恶俗狡猾的实验主义之杜威，有悲观颓废之罗素……严然先后辉映，形成欧洲最恶臭之潮流。已经腐败且准备自己毁灭之欧洲布尔乔亚，已无力继续人类伟大的遗产了。我们那时恰遇此类恶潮流滥之时，却乃如获异宝，源源输入，当时如胡适，如张东荪，如张君勱……等人，都是愿为前驱，努力翻译其著作，翻译之不已，且迎入我“中土”，遍游国中，以后且竟将亡国之泰戈尔，都拿来作为消灭民族精神之毒剂，而充为我们思想界之一新的构成成分。这也许是中国历史发展所屡见之又一种“时运”的不佳吧：外来思想不输入则已，一经输入，则不能准备或继续扩大新思想之发生和发展，反而增长我们腐化之潮流。

但是，我们这里还应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本身方面加以说明，一个外来的进步思想或落后思想之到来，诚然可以使一国思想的发展，增加重大的助力，并使其发生种种的变化，这是我们所不否认的，然这种思想之吸收程度如何，或排拒之程度如何，仍不能不侧重其本国之内在的和必然的原因。例如，英国的情形。我们知道，近代唯物论除了英国以外，原是我找不到它的祖先的，但不久以后，唯物论的字眼，竟是大多数英国读者所不能入门，英国那时思想发展，自己通过了一个复古和信神的时期。后来法兰西唯物论大大的发达，然而这种情形，对于英国思想的影响，不是正面，却是反面：“唯物论愈成为法兰西的信条，信教的英国布尔乔亚，就愈固执他们的宗教。”我们这里自然不是拿它机械地应用到中国的说明，然而一般历史共通性，却非常类似，如果英国的此种情形，是因为英国的那些“离开旧贵族便不能生活”的“没有受教育的人”的落后性所致，那末中国特殊历史发展的道路所生的结果，是“更落后”。从经济史的术语上说，便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更夹杂有旧成分，中国的那些“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不能上进和最怯懦的一种人，我们如何能希望他们自觉地去搬运先进国

的进步文化思想，作为自己遗产来承继呢？

所以五四运动是中国最初的“黎明运动”。同时也是“黎明运动”的终止点。五四运动以后所发生的，是一种五四运动的“逆流”和五四运动的精神对抗的时候。这种逆流便是欧洲反动没落的哲学思潮和中国自己的本位传统相合成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最足以表现这一点。这个论战本来是五四以后，人们欲进一步探讨宇宙观和人生观的，如果有好的环境的帮助，可以使五四运动继续发展而得到好的成果，但不幸旧的恶劣传统，却就来阻止它前进。这次论战，无结论而罢，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五四运动告终而逆流发生之交替产物。这个逆流暗淡了五四的光彩，甚至过去提倡五四运动的人，除最少数外，都堕落了。五四运动是没有得到彻底完成的，这个彻底完成的任务，留到今后的我们了。

中国历史走得快，一下子又把新生活的阶段，变成为“过去的”了。另外的一种思想，又紧接而生，这种情形也在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中表现出来。这种思想的发展，依历史的逻辑顺序说，原是可以继续发展这个“黎明运动”到底，但事实的结果，却是相反的。此时“黎明运动”的以前担负者更不前进了。而新起的人中，也没有思想家自觉地去担任这个任务，而跳一步先来进行更新的一种思潮——社会主义之宣传。历史的矛盾，简直不能够以“通常的”道理计算，尤其是中国畸形发展的历史。

假使说，过去了的“黎明运动”是出现得太快，没有遗产。没有吸收先进文化，那末，后一段的思想发展，亦更是如此，它因为五四运动的微弱，使它亦显得先天不够。我们知道：五四运动发生后不及四五年，便发生了“二七”运动，在如此匆促的剧变时间内，他能够在思想上做些什么呢？他一样地是像五四运动，请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便算尽责一样，它除了搬来了社会主义四个大字和一般概念以外，没有什么，许多社会主义者，都轻视“哲学”——一切宇宙观，人生观和方法论等，而没有深入的教育和传统的涵养。

它也和五四运动在国际遇了“没落思想”那种不幸命运一样，一九二一年恰是在国际上开始陨落和发生变动的时候。于是历史又走上了失败的道路。

四

总括我们以上所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显著变动，先是“五四”前后的一个时期。五四运动以前和以后，又各为一时期：（一）五四运动以前——即自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为一时期，这是儒教渐次有被打击的表现的时候，富有思想力和革命气质的谭嗣同，在近代思想史上，是应有他的首举义旗的地位的。此时是五四运动的酝酿前期；但在这个时期中已表示出旧传统是如何为毒的倾向，并证明后来思想发展之空虚。（二）五四运动以后——即自五四运动至一九二七年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中，表现二大倾向：即中外恶浊潮的流布，成为此后全部思想界之大害；一种便是紧接而来之新思想的登台。此时又是五四运动终止而新运动继起的时候，中国近代思想发展，以戊戌时期为开始，到一九二七年经过了三个变动的阶段。

一九二七年以后，又自成一时期，然而这时期并未终结，正待我们在种种失败之后，深思默虑，准备开始新的年代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们曾发生过自我批判的一部分的工作，以现实经济和过去历史为主要对象，——这便是社会史论战等等的发生。然而历史上的缺憾和遗毒，留给我们太多了，整个思想局面是一个混沌局面；历史上种种病根，在我们这个时代，都汇合一起，形成中国思想界内容之主要特徵。

所以现在正是我们觉悟的时候。我们从思想发展的自我批判中，得了以下的几个重要的

结论：

第一，中国思想发展的特殊进程，使中国旧的传统，特别起了阻力的作用，这种传统的本质，是一种最有腐化性质，保守性质，反对进步——即最麻木民族强盛精神的要素。这种传统自康有为以后，“煽思想界的奴性而补益之”的方法，更是花样翻新：东方文化派，保存国粹派，国家主义，曾用种种形式来表现它的反动作用，它纵然不用公开的形式，（但公开形式在现在还是大无畏地进行着呢！）亦采取种种含混的形态，“不自觉地”夸大“特有文化”“固有精神”等等来发挥或隐存它的毒质。

第二，中国两次新思想运动的抬头，都是适处于世界的国际文化或思想传统没落之时，中国不但不能吸收新的强壮血液，而且不幸注入了毒汁。这种毒汁，实构成中国思想发展之重大阻碍物，且为两大历史运动走入空前失败之原因，而使中国今日民族益陷于萎靡不振的地步。

第三，是中国思想发展迫于历史的限制，不得不依着突进和跳跃的步骤前进，特别是二十余年来的中国思想发展，走上西欧二三世纪的道路；然由其发展本身来说，都是前一时期数量上未有充分和必要准备之时，便引起后一时期质量上之急亟的变化。时间不允许照应有过程再依样画葫芦，这是中国特有的思想发展道路。中国思想的历史发展，在外表上虽进步最快，但恰因此其内容上更比谁都来得特别枯竭和空虚（同时，也恰因此，才使落后思想占据了最大的地盘。）

这些便是中国历史留给我们今日思想界的特殊内容。

历史的债务，压在我们的身上，要我们一次来偿还。假使我们没有绝大的勇气，绝大的觉悟，我们是不能胜任的，胜利更谈不上。

我们最先需要一个觉悟，便是历史的觉悟。什么是历史的觉悟？便是我们应当彻底的了解我们以往文化思想发展之历史的共通性。不论任何的一个国家思想都是历史的产物在一定历史阶段上，便会产生一定的思想文化。他们中间是有共通的本质的。我们中国以前的历史，假使是停止在落后的封建社会之中，则他的文化思想、亦不能超出一定的范围。文化思想是有历史限制性，但它没有地域限制性。地域的差异，只是历史差异的条件。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差异，只是因为东方国家是处在历史上落后的一种社会，而西方各国则是更高级社会之故；地域的差异，只是造成此二者发展之所以前后迟早不同的条件而已。中国的古代文化思想，在世界史上，是相当于过去的阶段。我们当从时间的连续上来了解它在历史上所占之地位，而不当从空间上认定其地域上，固定不变的性质，一个是进化的观点，一个是反进化的观点。

我们知此，才不至自我夸大，才能深刻理解现状。目前文化思想的发展，更已不是一国的现象了，它是依着国际水平而向前动荡着的，各国发展的不平衡和其特点，必须依着国际水平来测量，而且要依着这个水平（它是最高和普通的综合）追赶上去。若我们今天对于中国思想的发展的观察，不具有世界文化的眼光，那它将是永远落后。

一个民族的发展和灭亡，是和这个民族思想发达程度有重大关系的。受颓废思想侵入的中国民族，每当一次外族侵入，不但不能抵抗，而且那些“礼教的”衣冠禽兽，皆屈膝相迎，甚至借外族以压同族之受压迫者，明末吴三桂之欢迎满人入关镇压李自成的暴动，清季最无耻儒生胡文忠、曾国藩，则依靠“西洋人”及其枪炮以屠平太平天国革命！历史上的统治者和他的文化精神，是只要阶级利益而不要民族。只有被压迫者的阶级战斗性和伟大民族独立精神相一致。中国的传统文化已证明它是足以室灭国内此种民族自立于国际舞台之战斗

性。

法兰西大革命，是它的民族兴起之无限光荣。然这正是因为它和欧洲各国不同：它一开始就坚决和旧的传统完全断绝一切关系，一开始就脱去神衣而登上赤裸争斗的舞台。我们可以说，没有卢骚、福祿特尔，和那些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家，便没有永远照耀简策的十八世纪法兰西民族的胜利。思想运动对于民族之向前迈进，能比此更明显和对我们更有教训吗？

中国过去历史的失败，正因为思想运动赶不上事变发展的迅速，致不能使五四等新文化运动和后来各种新思潮运动真正成为广大运动之最坚定的自信力、吸引力、和组织力，不能推动它到底而达中国统一和独立的成功。这真是多么悲惨！历史叫我付了太大的代价了：后起的种种逆流，使我们民族忍受帝国主义的刀刀“分割”，和在“亡国”的憧憬之下，通过了一个摸索时代。

现在是我们中国民族受难的年代。但同时也是我们走向民族复兴的过渡时期。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在他受难年代，正是已消纳和研究历史的教训之时，痛定思痛亦足使其沉思默虑，卧薪尝胆，以再图振作；假使说，新的民族复兴，依着客观之发展，是必然的到来，那末，我们便应当学习法兰西的教训：即我们如果在事前能发生一个大的进步的思想运动，便可加速这个新阶段的到来，且可使在更有利的形式中推往前进。正是因为中国社会发展过于落后，才需要我们组织一个更高度的，更丰富的思想运动，先行于伟大的历史事变。最落后的国家，产生了最进步的思想；而且此种思想是在该国民族受难年代中锻炼出来的，此二者正和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之不平衡一样，同样是一种不平衡的历史规律。在此种意义上，中国目下是需要创造一种思想的历史运动，造成中国近代思想发展中一个更高的，新的历史阶段。

五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对于目下中国思想的建设工作，有以下主要的数点：

一、我们应当作思想历史的自我批判运动——我们应共同努力来建筑一座“中国古代文化或思想史”的机构，藉此以清算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阶段，揭发中国传统思想的本质及其历史地位，并系统地提出有史以来所有进步思想之不断的痕迹，且发挥其精神。特别是战国时代的各种自然，人生伦理思想和自由的性质，尚须更正确的分析，扫清历史之阻力而推动新思想前进。

二、我们应系统地作搬运先进国历史上进步思想的重大工作——我们对于古代希腊罗马的，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各世纪的英、德、法、俄的一切哲学，经济，政治等思潮，应不断输入，那些都是各国民族青春兴盛时期之怒发思想。我们应尽量介绍和翻译赫尔克里德、伊壁鸠鲁、培根、霍布士、笛卡尔、斯宾诺查、拉美特利、狄第德、佛尔巴黑、卢骚、福祿特尔、黑格尔、布列哈诺夫等等的主要著作或其全集。然而我们不仅单纯的输入，主要还须加以综合的理论研究和深刻的历史探讨，俾能充分发挥其中心精神，藉以形成新的历史思想运动之丰富源泉，同时亦即所以继续和扩大五四运动的精神。历史发展使我们的思想发展也要依不断的道路向前而走。

三、思想的“自由批判”运动——这是我们思想创造和建设工作的前提；没有这，便是损失前提。我们旧的文化传统在古代之所以胜利，便是在钳制“异端”学说的发展战国时代正是“异端学说遍天下”的时候，而它反是中国思想最放光彩的时候。可见思想的发达，即思

想之“自由批判”，是如影之随形，而不可以须臾离的。真理只有在最坦白的比较和最热烈而争论中得来的。卢骚所呼喊的“自由精神”，不但是我们思想界所需要的要素，而且是中国民族所必不可少的新生命！

“历史的自己批评”是提醒我们的自觉，介绍先进国的进步思想，是拯救我们思想界的空虚；思想的自由批判，是一种创造的动力。

历史是进步的，我希望一切进步的思想家，亦能站在历史的前面。

二月十二日

（原刊《文化建设》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一九年四月出版）

现阶段中国哲学界的派别

张聿飞

有人说：现代的中国没有哲学家。他们的理由是：因为现代的中国，根本就没有产生过系统的成熟的思想家。这话，我听了很难受，但是事实的暗示是这样，我又无法否认。我们不听得被称为中国哲学家的胡适博士大声喊过么？“哲学无用，哲学可以取消了，像你们的部长陈公博先生，就是从学哲学而改行到学实业的”。（大意如此，见胡适在南京实业部的讲演）诚然，“学哲学不能坐官”，或者说“政治舞台上不要哲学家”。我猜胡先生至少总这样想！果然胡先生在今年的哲学年会上，公然宣称他已经“改行了”！他是“哲学的门外汉”。我所以特别提出胡先生的原故，并不是想对胡先生作什么攻击或批评，我是有鉴于胡先生的意见，是可以代表中国人的一部份甚至一大部份的意见的，而且，从他的言论上，可以见得到现代中国哲学界之不景气的象征。我们明白了这种环境的背景，当然可以明白了“中国为什么不会产生系统的成熟的思想”，或者是说“现代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哲学家”的原故。

话虽如此，然而现在的中国学术界是有不少的人在讲哲学的，而且还有种种的派别，所以，现在的中国是有哲学界的。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想把现阶段中国哲学界的派别，择其影响较大，声势较壮者，作个概括的介绍，自然啦，这里面也有我自己不少的意见，或许可以说是批评。

是的，现代的中国是没有产生过哲学家的，因而所有现在中国哲学界的派别，都是根据于或者说是宣传了外来的哲学学说的，这样，要明白现阶段中国哲学界的派别，必须得先提到欧美间所流行的几派哲学思潮，加以叙述，然后谈到中国的哲学派别，才不致茫无头绪，或摸不着本源。

关于欧美间几派流行的思潮，概括的说来，可分五派，是：（一）新唯心论，（二）新康德主义，（三）实验主义，（四）新黑格尔主义，（五）新唯物论。

在这里，我不能详说以上各派的思想，我所要说的，只能作概括的介绍。